



在遗址上新建的桄榔庵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

◀ 清代桄榔庵图。 图片来源:朱玉书《海外奇踪》

人物春秋

贬谪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缘何安然无恙? 苏东坡的坎途贵人

■ 韩国强

元符三年(1100年)五月,苏东坡遇赦北归,游金山寺看到李公麟为他画的小像,动情地题诗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苏东坡为何看重黄州、惠州和儋州呢?究其缘由,因为他落难时,“亲友皆疏”,门生也多畏避不见,而“三州”的太守徐君猷、詹范、张中却格外袒护东坡,成为他这个“有罪之臣”的贵人。

徐君猷
“相待如骨肉”

元丰二年(1079年)十二月,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,责授黄州团练副使,“不得签书公事”。第二年正月,苏轼由差人押解,抵达黄州。时任知州陈轼将他安置到定慧院暂住,随后将临江皋亭修葺一新,让苏轼和家人进驻。

第二年七月,徐君猷接任黄州知州。徐君猷,本名大受,君猷是其字,以字行世,祖籍东海建安(今福建南平建瓯),熙宁三年(1070年)进士,史料称其“家世名臣,始终循吏”“绰有建安之风流”。

徐君猷到任后,对苏轼呵护有加。元丰四年(1081年)二月,苏轼因俸薪断绝,“问人乞米”,徐君猷拨城东旧营地五十亩给他躬耕。苏轼躬耕自食,一家老少得以吃饱。他高兴地吟道:“雨洗东坡月色清,市人行尽野人行。莫嫌荦确坡头路,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从此,苏轼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

徐君猷也是位风雅人物,非常好客。他听到苏轼抱怨黄州市上所酤酒味恶劣,所以每得好酒,不但招他来喝,且更携酒见过。苏轼有《浣溪沙》词记其事:“醉梦昏昏晓未苏,门前辘辘使君车。扶头一盏怎生无。废圃寒蔬挑翠羽,小槽春雨滴真珠。清香细细嚼梅须。”苏轼《南乡子·重九上君猷》也有他们节日饮酒快乐的记载。

有一次,苏轼与朋友在江上饮酒,醉而归,作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有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句。顿时,黄州传苏轼驾舟长啸而去。徐君猷闻讯,立即前往临皋亭,苏轼鼾息如雷,不觉大笑。

因有宽松的环境,苏东坡才得以创作千古绝唱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。

徐君猷与苏轼之交,没有长官与谪官之

间的隔阂,而且关系亲密。苏东坡给一封书信中曾写道:“某始谪黄州,举目无亲,君猷一见,相待如骨肉。”

詹范
“父老相携迎此翁”

元祐八年(1093年)九月,高太后驾崩,哲宗皇帝急欲彻底变革,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。章惇为相,报复元祐诸臣。十多天内,苏东坡被三改谪命,最后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,惠州安置。

宋不杀大臣,以贬岭外为最重的惩罚。绍圣元年(1094年)十月二日,苏东坡抵达惠州,有诗云:“吏民惊怪坐何事,父老相携迎此翁。”

惠州太守詹范破例招待苏东坡暂住合江楼。此楼是三司行馆,招待宾客用的。因

合江楼不是谪官可以久居之地,苏东坡住了半月,便搬到嘉祐寺去住。

詹范,字器之,崇安县(今福建武夷山市)星村黄村人,嘉祐八年(1063年)进士,苏东坡称其为“仁厚君子”。

詹范每到佳节便与苏东坡对酒欢歌。绍圣二年(1095年)上元夜,詹范带厨子和酒菜到嘉祐寺陪东坡过节,东坡有感而发,作《上元夜》诗,“使君置酒罢,箫鼓转松陵”“浩歌出门去,我亦归吾腾”。一月后,苏东坡携水鲈鱼,回访詹范,作诗:“醉饱高眠真事业,此生有味在三余。”

《苏轼诗集》收录东坡与詹范唱和诗有《惠守詹君见和,复次韵》《詹守携酒见过,用前韵作诗,聊复和之》。诗中用王弘与陶潜故事,说詹范相待甚厚。

詹范是位清明好官,任职惠州时,兵荒之后,野多暴骨,詹范取而掩之。“江干白骨已衔恩”是对詹范此举的礼赞。东坡还特作《惠州祭枯骨文》《葬枯骨疏》盛赞詹范的善举。

惠州有东江穿城而过,江水暴涨,桥易冲坏,不便百姓出行。东坡采用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建议,改用船桥。詹范等协力筹措经费,东坡捐出犀带,建成东新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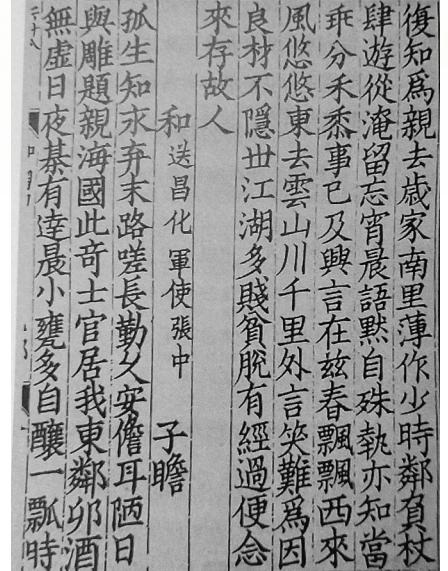
张中
“邦君助畚锸”

绍圣四年(1097年)四月十七日,苏东坡被责授琼州别驾,昌化军安置。东坡携幼子苏过渡海,同年七月二日抵达昌化军城(今儋州中和镇)。

张中,开封人,熙宁三年(1070年)进士,元丰二年(1079年)任明州(今浙江宁波市)象山县尉。张中比东坡晚一个月到儋州。

张中到任后得知东坡父子露宿桄榔林中,十分难过,当即派兵修葺破旧不堪的驿舍,让东坡父子居住。

那时朝廷新党进一步发起对元祐党人



苏轼的和陶诗《送昌化军使张中》。
影印宋刊本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》

崖州三线纺车 纺纱工具升级的民间版本

■ 吉承湖

主轴轮和四轴传动。

脚踏杠杆位于机架前端,呈L形,当操作者脚踏踏板时,杠杆绕支点上下运动,通过连杆带动主轴轮旋转,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,这一设计比手摇纺车更符合人体工学,可通过腿部肌肉发力,持续提供动力。

主轴轮直径约0.5米,轮缘均匀分布着12个木质齿牙,以风叶形式设计,可减轻重量,既保证旋转时的惯性,又不会因过重而消耗过多体力。



袁金华 摄

在乐东黎族自治县的白沙河谷博物馆,陈列着一件跨越时空的文物——三线纺车,2012年经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文博专家鉴定为一般文物,年代为民国。

这台三线纺车是1982年由当地纺织匠人“乐罗嬢”捐赠给“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”(博物馆前身)的,其通体由硬木制成,主体结构包括机架、传动系统、纺纱装置三大部分,全长约1.2米,高0.8米,虽历经岁月侵蚀,仍保持着完整的机械结构。

机架部分采用榫卯结构拼接,没有一钉一铁,却异常稳固。底部由两根平行的横木作为基座,间距约0.6米,确保纺车放置时的平衡性。基座上方垂直立起两根立柱,高约0.7米,顶端以一根横梁连接,形成“门”字形框架,既减轻了整体重量,又为传动系统提供了稳定的支撑。立柱内侧刻有细密的凹槽,用于调节传动轮的高度,以适应不同粗细纤维的纺纱需求,这种可调节设计,展现了工具对生产需求的灵活适应。

传动系统是这台纺车最具技术价值的部分,采用人力脚踏杠杆摆臂转动主轴轮,以皮带传动,三轴金属卷纱轴心棒带动三轴传动的设计,实现了动力的高效传递。

这台三线纺车核心构件包括脚踏杠杆、

三线纺车主轴上部安装有三个相同直径的传动轮,通过皮带(古代多为麻绳或棉线制成)分别连接三根纺纱轴顶端的传动轮,形成“一主带三从”的传动格局。这种四轴联动的设计,使得单个动力源可同时驱动三根纺纱轴运转,实现三线同时纺纱。这正是其“三线纺车”的由来。

与传统的手摇单锭纺车相比,这台三线纺车的技术优势显而易见。首先是采用脚踏动力,解放了双手,使操作者可专注于纤维的梳理与喂入,减少了操作环节的干扰;其次是三线同时纺纱,理论上效率是单锭纺车的三倍;再者就是传动系统通过不同直径的传动轮实现变速,可根据纤维粗细调节纺纱速度,适应棉花、麻、丝等多种原料,等等。

白沙河谷三线纺车的技术核心——三锭纺纱设计,是中国古代纺织技术长期演进的结果,其直接源头可追溯至元代黄道婆对棉纺工具的革新,即从“一锭”到“三锭”的跨越。

在黄道婆改良棉纺织技术之前,我国的纺纱工具长期停留在单锭阶段,一次只能纺一根纱线。据《农书》记载,单锭纺车“一妇一日之力,仅能纺三两纱”,效率低下,严重制约了棉纺织业的发展。当时的棉花加工,

从去籽、弹花到纺纱、织布,工序烦琐,而纺纱环节的瓶颈尤为突出,使得棉布价格高昂,难以普及。

黄道婆的三锭纺车采用脚踏传动,与白沙河谷的三线纺车在原理上一脉相承,但在细节上因地域差异略有不同:江南的三锭纺车主轴轮直径更大,约0.6米,传动比更高,适合纺制细纱;而海南的三线纺车因热带地区棉花纤维较粗,主轴轮稍小,纺锭线槽更宽,适合粗纺。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技术传播过程中的地域适应性改造,黄道婆的技术并非简单复制,而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根发芽,演化出各具特色的地方版本。

三锭纺车的革新意义,首先体现在生产效率的飞跃。单锭纺车每人每天最多纺3两纱,而三锭纺车可达到9两以上,若操作者技术娴熟,甚至可达1斤(旧制16两),效率提升3至5倍。

无独有偶。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,英国也发明了三锭纺纱机,即“珍妮纺纱机”,其基本原理与我国古代的三锭纺车惊人相似。这一事实足以证明,中国古代在纺织机械领域的技术水平曾长期领先世界。

咖啡初传中国时

史籍典录

■ 周惠斌

咖啡发源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。coffee一词的通用汉译名“咖啡”,最早见于1819年马礼逊编纂的《华英字典》,但在清末的报刊书籍中,它另有五花八门的译名,如“茄菲”“珈琲”“考非”“高爵”“磕肥”“枷榧”等,不一而足。

林则徐编译的《四洲志》中,至少有“架非”“加非”“架飞”三种写法。1866年,为培训服务于洋商和传教士的中国人学会烤面包,做西点、煎牛排、煮咖啡,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不的夫人,用汉语编写了一本私家食谱《造洋饭书》,介绍了268种西菜、西餐的做法,书中将咖啡译为“磕肥”。1873年9月22日,《申报》刊登《电报英京巨银行闭歇事乃讹传》一文,将咖啡译为“加非”;1875年11月10日刊载的一篇《轻生说》中,首次出现“咖啡”二字。1887年刊印的《申江百咏》中,有一首竹枝词“几家番馆掩朱扉,煨鸽牛排不厌肥。一客一盆大嚼,饱来随意饮高爵”,将咖啡译作“高爵”。直到1920年代后期,coffee才有了相对统一的译名“咖啡”。

作为舶来品,咖啡传入中国,是在鸦片战争之前。彼时,清王朝闭关锁国,通商口岸仅广州一个。1836年前后,在今天的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附近,丹麦人开设了一家西茶餐厅,以浓郁的咖啡香味吸引了众多外国顾客,成为广州、也是中国第一家经营咖啡的场所,标志着中国咖啡文化的开端。

1843年上海开埠后,咖啡最迟在1844年进入上海。据一册名为《OR7400各号验货》记载,1844年5月18日,“第19号船,公正行进口枷榧豆



民国时期沪上报纸刊载的咖啡广告。

5包,每包70斤……”而当年在上海,购买咖啡豆的唯一途径是拍卖。彼时,上海还没有独立的咖啡馆,仅外国人开设的一些饭店、夜总会、俱乐部中才设有咖啡室,如1846年对外经营的礼查饭店,咖啡室即附设于旅馆之中。《上海通志》记载,1853年,英国药剂师劳惠森在大马路(今南京东路)花园弄1号开办老德记药店,以经营欧美成药为主,兼营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、烟酒、糖果、冷饮等,但所提供的咖啡,最初却被老上海人视为“咳嗽药水”。

19世纪下半叶,上海的番菜馆(西餐馆)开始以餐后饮料——咖啡招揽顾客,引得国人纷纷尝鲜,《申报》曾在1876年刊登番菜馆的咖啡广告。据《清稗类钞·西餐》记载,1883年,位于今福州路、山东路口的“一品香番菜馆”,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西餐馆,餐后供应“咖啡一盏”,从此,到番菜馆吃西餐、喝咖啡成为一种时尚。上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,是1886年公共租界内的虹口咖啡馆,但只向海员开放。1906年,福州路上的宝利咖啡店,是上海第一家正式对中国人开放的独立咖啡馆。

1920年代后,营业性咖啡馆在上海大量涌现,逐渐形成规模化的街区咖啡馆。其中,著名的有卡尔顿咖啡馆、皇家咖啡馆、特卡罗科兄弟咖啡馆、惠尔康咖啡馆、沙利文咖啡馆、上海咖啡馆和公啡咖啡馆等,它们多由法、俄、意、日侨民和到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开设,主要分布在被称为“小彼得堡”的霞飞路(今淮海路)、“神秘之街”的北四川路(今四川北路)和“小维也纳”的汇山路(今霞山路)等三个区域。随着咖啡文化的日益普及,咖啡开始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喜爱,成为与茶相媲美的饮品,以致不同形态的咖啡,如咖啡粉、咖啡霜、咖啡糖、咖啡汁、咖啡茶、咖啡糖浆等,走进了千家万户……1926年,《兴华》杂志报道,上海每年购入咖啡约在千万元以上。

与此同时,咖啡在广州、天津、汉口、北京等城市也日渐兴盛。民国时期,北京西单的英林咖啡馆、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,以及葆莲斋咖啡馆,是老北京的三大咖啡馆。1935年,北京学生掀起“一二·九”运动,总指挥部就设在西单一家咖啡馆的二楼。

百年来,浓郁的咖啡与都市人群摩登洋气的消费观念不断融合,充满异国情调的咖啡馆,更是见证了传统与现代、东西方文化在现代都市的邂逅乃至水乳交融,成为市民聚会聊天、休闲社交的活动空间。

(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文
史
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文博苑